

## 论锡伯族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

佟克力\*

满文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曾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有近500年的历史。现在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金汗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文字，他们即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后人所称之“无圈点满文”，或称“老满文”。从使用上讲，该文字很不完善，如有的字母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音，不便识别，故只通行32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命达海，库尔禅将无圈点老满文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满文进一步完善，使用更加方便。顺治六年(1644)满文被尊为“国语”，又称“清语”。经“康乾盛世”满文几经规范，更趋完善与规范化。有清一代，满文无论在清政府的政务活动或广大满族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满语满文自咸丰朝以后逐渐衰微，满族逐渐改用汉语，汉文，到清末已基本放弃满语满文。

而乾隆二十九年(1764)奉命西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惟一的交际工具使用到解放前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1947年察布查尔锡伯族学者将满文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除，另创了新音符符号，改革为锡伯文。实际上，锡伯文就是满文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锡伯族对保留和发展满语满文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试对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以求学者专家们的指教。

www.kci.go.kr

语言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新疆的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与其移驻新疆前的语言现状密切相关。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后裔，据史料反映，明清以前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採用何种形式语言尚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清初锡伯族使用的语言与满语极为相近。如“锡伯或史伯，其语言近满洲。”<sup>2)</sup> 锡伯族于康熙三十一(1692)年归顺了清朝，但当时即能与满族互通语言。据清代档案记载：“康熙三十二(1693)年十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副都统阔特虎给齐齐哈尔协领麻齐的来文中称：“为俄罗斯使者之骆驼，马等倒毙之事送理藩院行文一封，因此地无有会书写送往蒙古路驿站之蒙文文书之人，故用满文写就了底稿，并盖了印章。由彼处锡伯中会蒙文者，令其照满文写成蒙文文书，送往蒙古驿站，并按驿站传送。此送。”<sup>3)</sup>

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给齐齐哈尔副都统麻布岱的行文中称：此地需派官陪同俄罗斯使者，到达尼布楚之后，同俄罗斯交谈通用蒙古翻译，望派来熟通蒙古语之人。查此地没有熟通蒙古语者，以在彼处的锡伯披甲中，拣选娴熟蒙古语者，能将咱们的话传达给他们，将他们的话传达给咱们者两名，令带两个月的食米，同俄罗斯使者出发，到此来见所派之官。此送。”<sup>4)</sup> 从以上两条档案资料反映，锡伯族在归顺清政府之前，就娴熟满语满文和蒙古语，蒙古文。锡伯族于康熙三十一年被科尔沁蒙古王公献出，被清政府整编驻防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吉林等军事要地。此时正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初。该条约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在尼布楚城附近签订。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沙皇的侵略魔爪暂时受到一定遏制，我国

www.kci.go.kr

2) 清·博明希《西斋偶得》。

3)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条。

4)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条。

的黑龙江地区开始获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但中国领土主权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利益却受到损害。条约签订后，中国即履约刻石立界碑于中俄边境上，并建立了巡边制度。俄国使者也不断前往中俄边界行使公务。当时，我国东北同俄罗斯接触要通用蒙古语，但缺乏这类专用译员，结果从驻守齐齐哈尔的锡伯族披甲中挑选能胜任满，蒙语言翻译者，充当两国间的外事翻译。由此可见，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时期即操用满语或与满语相近的语言。且满文功底相当扎实。

清政府入关后虽然定都京师(北京)，但一向特别重视盛京，将其视为“龙兴之地”，并作为陪都。满族入关后，将清军大批精兵强将派遣到全国各地，使盛京地区的防务相应削弱。至康熙年间，盛京地区的兵力遂显薄弱，“由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等来充当八旗驻防兵。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东巡东北，在检阅八旗官兵时谕曰：“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不像围猎之兵。将军惧于诸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风气极坏。……再，盛京兵丁多不讲满洲语，不谙马步箭，极为懦弱。据此，请飭盛京将军等教习马步箭，满洲语。其中极为懦弱者，更换替补。”<sup>5)</sup>面对盛京地区八旗官兵懦弱的现实，清廷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驻防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地的74个锡伯牛录6,600余人调入盛京地区，分散到盛京，锦州，盖州，牛庄，金州，岫岩等数十处，驻守要隘，台站，同满洲合编牛录，加强盛京地区的军事防务。这批锡伯族官兵调入盛京地区，在强化盛京地区军事防务的同时，对于已经不会讲清语(满语)的满族官兵，能够接触满语水平较高的锡伯族，对他们学习和巩固满语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满文的创制以及推广，巩固，清代历朝皇帝都予以极大的重视。推广满语，应用满语满文被视为巩固清廷统治的措施之一，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清朝“国语”，倾注了不少心血。三个皇帝都非常精通满文，并且三令五申要求广大满族官员，兵丁加强“国语骑射”的学习。但随着大量满族

5) 《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 第125页。

官员入关，汉族出关，内外交流，各民族杂居，满族人民处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不断吸收汉文化，致使满语，满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汉语，汉文所取代。考察满文档案，道光，光绪朝以后档案中满文文件明显地减少，汉文文件占大多数。满语，满文的实际应用情况，从康熙三十七(1698)年康熙东巡东北时就已显现出。到乾隆朝，满洲官员不会讲满语，不识满文的情况更为突出。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一件上谕中指出：“今日理藩院侍班官内有四员，不惟清话生疏，甚至竟不能者习伊等俱系满洲人员，所司又系清字事件，若全然不晓，何以办事？由此而推，则衙门各员内不能清话者，当复不少。清话原满洲根本，旗人首当以此为务。倘不专心习学，以至日久生疏，则成何体制？”于是要求“京察之年，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又宣布：“伊等不循照此保举引见时，留心试问有不能清语者，唯该堂官是问。”<sup>6)</sup> 根据这一条谕旨，盛京将军衙门作规定：“嗣后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写清字；其他部院咨报之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者，须译成清字。”清廷将清语视作保持满洲传统之根本。为保存满文，在任用官员，官员保列，引见等方面把熟悉清语作为首要条件。而且在上呈下达的文件中也把应用清文做出明确的规定。尽管清廷为了保持满文采取了以上措施，但奏效甚微，未能挽救满语满文走向衰落。乾隆三十四(1695)年盛京将军恒禄查盛京八旗官兵清语骑射情况后上奏道：“奴才窃查盛京之八旗满洲，蒙古官兵之骑射。官员之技艺虽有差异，但尚属谙练，其兵丁内不娴熟者十之一，火枪技艺尚属整齐。考清语，新满洲，锡伯，蒙古内能够说者，勉强能够应付眼前者，不能者各有别；旧满洲，边军官兵内有会说且能听懂者，索性不能说且不懂者甚众。”<sup>7)</sup> 由此可见，归服清廷较晚的新满洲，锡伯，蒙古等，因地域关系，接触汉文化较晚，因而满语水平与满洲相比略高一筹。盛京将军恒禄于乾隆三十六(1697)年九月的一件奏折中称：“奴才，今年七月十五日前往盖州，熊岳，复州，锦州，旅顺水兵等营检阅，验官兵清

6) 辽宁省档案馆藏 《黑图档》 卷329。

7)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条。

语，锡伯等均能说清语，余员虽与前有所好转，但不能说，且不能懂者仍属甚众。”<sup>8)</sup> 以上是锡伯族西迁新疆七年之后留驻盛京地区锡伯族的语言状况，其中可折射出锡伯族西迁新疆之前的语言状况。其大环境是盛京地区满洲官兵会说满语者甚少，而锡伯族这个小群体均能说满语，这一语言基础，为迁居新疆的锡伯族日后继承发展满语满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

有清一代，清政府将“国语骑射”作为治国之本，将其视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基本国策来推行，并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官员要加强“国语骑射”的学习。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大清帝国的组成部分，必然也要推行这一政策。在新疆，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驻守伊犁地区的锡伯族继续使用满语满文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前后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和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清廷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从盛京所属的辽阳，锦州等十五处，抽调锡伯族官兵同眷属4000多人，西迁驻防伊犁地区，从此锡伯营官兵同在伊犁地区驻防的满营，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绿营等军民，共同防守天山南北。清朝在新疆推行的是军府制的统治制度，文武官员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定期更替，驻军则为掣眷驻防。

有清一代，地处祖国边陲的新疆，民族成份繁杂，清前期将满文作为统治阶级的官方语文，并极力推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满文档案资料。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帝要求“新疆所办事件，应用清字折奏 即有矣涉地方事件，如

8)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条。

清字折奏，有不明晰，亦应如盛京用清汉字兼写具奏，……至伊犁，乌鲁木齐二处，多系民间事件，亦应清汉字兼写具奏，不可单用汉字奏折，将此通行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新疆驻扎大臣等一体遵办。”<sup>9)</sup> 乾隆年间，不仅新疆地方行政机构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上呈下达的公文使用满文，而且在民间，满文作为官方文字，比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等使用广泛。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军机处的上谕中称：“军机大臣等议准，哈喇沙尔办事大臣海城奏称，察罕通格卡座向无驻防满兵，惟绿营把总、外委各一员，兵十名驻守。而土尔扈特、和硕特自移哈喇沙尔，办事俱用清文，往乌鲁木齐，辟展等处贸易，往返照票，俱填清字，驻察罕通格卡座弁兵，不识清字及蒙古语，恐不能查诘，请裁把总，外委，就近于乌鲁木齐满洲前锋，马甲内，调通清汉蒙古语者一名，委置笔帖式，驻该卡座，查对照票，访拿逃匪。”<sup>10)</sup> 满语不仅作为官方的通用文字，而且要镇隘口的“关防”也满汉，托忒蒙文兼用。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起，“改铸分巡镇边粮务兵备道，兼管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晶河等处事务关防，兼用清，汉，托忒三体字。”<sup>11)</sup>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满文在新疆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无论在清中央政府，地方办事机构，民间都是做为通用的交际工具，其使用范围远比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广泛。这就为其他兄弟民族学习满语文提供了大的环境。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努力学习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深深感染了其他兄弟民族学习满语满文。乾隆皇帝曾说：“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既可以余暇之消遣，复足朕中外之性情。”<sup>12)</sup>

乾隆帝学习回语(维吾尔语)，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上层的影响颇大。乾隆五十六(1791)年阿克苏办事大臣佛住奏称：“阿奇木伯克迈默特阿布都拉，呈请设

9) 《清高宗实录》卷1250。

10) 《清高宗实录》卷1078。

11) 《清高宗实录》卷1333。

12) 《三体清文鉴》序。

立清文学，选其子弟及众伯克子弟，质可造就者，教习礼仪清语，可否准行，奏闻请旨等语，此诚美事，所请甚属可嘉，朕深欣悦，加恩赏给迈默特阿布都拉大缎一匹，著佛住即照其请，准设立清文学，仍择通晓清文清语员弁，令其在留心教授。”<sup>13)</sup> 少数民族要求设清文(满文)学堂，对清政府来说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因此大力支持。对于提倡者给予物资奖励，并派遣教员教授满语。乾隆年间，新疆少数民族所办的满语学堂并没有流于形式，而是卓有成效。嘉庆二十年(1816)一件上谕中提到：“额敏和卓之孙啞什咱特，稳妥有识，通晓清文。”<sup>14)</sup>可见清代新疆少数民族中通晓清文者不少见。

综上所述，清乾隆年间，在清廷推行的“国语骑射”的治国政策感召下，少数民族积极学习满语，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满文的地位。这种由社会各界形成的文化氛围，对于操用满语，满文的西迁新疆的锡伯族继承和发扬满语满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锡伯族屯垦戍边所处的社会组织和地理环境，也为他们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三

清代在新疆推行的是军府制统治。八旗制是军府制统治下的基层组织，兼有生产，行政和军事三种职能。锡伯族自康熙三十一(1692)年归服清政府之后便被编入八旗。奉命调遣的西迁官兵于乾隆二十九(1764)年离开盛京，于三十(1765)年抵达伊犁绥定。在绥定休整期间将十个扎兰(队)整编为六个牛录。三十二年(1767)将六个牛录合编为八个牛录，南迁伊犁河南岸，组建伊犁锡伯营。其主要任务是守卫伊犁河以南地区的十八个卡伦及台站。此外还防守塔

13) 《清高宗实录》卷1382。

14) 《清仁宗实录》卷304。

清代的八旗组织机构非常严密。各营设领队大臣一员，属京缺，由清廷直接任命，由满族官员内挑选任命，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总揽边防事务；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设于本营，称之为“总管档房”；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称“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官员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锡伯营八旗每一牛录即一个村落，亦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每旗(牛录)约有200户左右。锡伯营八旗虽然是官方性质的机构，但它和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各级官员基本来自大姓(哈拉)富户，他们一方面为上一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又向本哈拉莫昆负责。而哈拉达(长)和莫昆达(长)又向本哈拉官员负责。一旦发生纠纷，便要自上而下追究责任，使无论是代表哈拉的牛录官员还是哈拉达和莫昆达，都要忠于职守，各负其责，完成所负的各项社会义务。清代锡伯营八旗制，在封建政治和军事统治下有机地结合为无论从外部或内部都难以攻破的堡垒。八旗组织范围内的所有活动，包括公务活动，民间各项活动，都要受到八旗组织的监督，不准有任何超越该组织规定范围的行为，即使人们的家庭活动，也要受其间接约束。所以在清代封建八旗组织中，伊犁锡伯营八旗存在时间最长。在这种结构严密的八旗制度下，锡伯族军民既没有政治自由，又无其他权利。清政府对新疆驻防兵营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兵营中不得引进闲人，尤其不准外族人过夜。“各城满，汉兵丁在城差操或分驻卡伦汛地，均有住宿兵房，非奉公差不得任意出入回庄游荡，如有潜赴回庄住宿者，准伯克回子等缚送本营大臣处加重治罪。该官约束不严，治以应得之咎。”<sup>15)</sup> 清政府还制定了八旗营旗制度十条：在旗人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不准与民人交产；不准与民人通婚；旗人禁止仿效汉人装束等等。同时还规定没有指派的外出任务，未经告假，不准离城二十里，擅离营地便以逃旗论处。锡伯营内部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外部有清政府对他们的各种限制与约束，使锡伯族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下，长期被八旗制所统治，内部成员又是清一

15) 《钦定回疆则例》卷八。

色的单一民族——锡伯族，其结果这种社会组织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文提供了重要保证。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需的前提。锡伯营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对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起到了重要作用。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河谷盆地。北部与伊犁河隔河与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相望，南部以山为界和昭苏县，特克斯县毗连，东邻巩留县，西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纵观察布查尔的地理位置，北部的伊犁河是个天然屏障。由于当时没有桥梁，夏季靠渡船摆渡或靠羊皮筏来运输，冬季只有结冰封河时才能通行，交通十分不便，从而客观上阻碍着两岸的往来。南有高峻的乌孙山脉，又起着天然屏障的作用，难以逾越。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也造成了察布查尔地区交通不便与闭塞，使这里长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区。在这个大环境下的锡伯族，又处在一个供给制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实体之下，官兵只发俸银，不发口粮，实行“官兵随缺地”制度，随缺地的分配方法，依官缺的品级由旗下档房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并且规定“旗民不交产”，“土地不得转卖”。官兵所分得土地即为“俸地”。锡伯营由于实行官兵随缺地形式，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考核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一旦被选上便成为一名披甲，可分得俸地，选不上则成为“苏拉”(闲散)，而得不到土地。如果要求生存，必须紧紧依靠八旗组织。锡伯族军民与八旗制有很强的依附关系。

锡伯营八个牛录都设有官仓，春耕时由旗下档房发放籽种，秋收后按额交粮。所积粮谷主要用于接济鳏寡孤独，特殊情况时借给官兵等。

锡伯营设公仓的同时，还设官牧场。所牧养的牲畜完全可以满足本营生产和军事需要。

锡伯族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菜园地。官兵自家还饲养牲畜和家畜。其他生产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本旗(牛录)内解决。各个牛录都有自己的木匠，铁匠，泥瓦匠，银匠等。还有磨坊，油坊等。

锡伯营的一个旗(牛录) 便是一个村落。都用城墙围起来。城墙一般高4~5米左右, 宽约4米, 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 为打夯筑成; 墙上有垛口, 东西南北各有门, 城门有专人负责看守。实质上是森严壁垒的大军营。锡伯族军民除执行军事任务, 巡视卡伦台站, 换防喀什噶尔与塔尔巴哈台而离开本营驻地外, 其他时间不得离开本旗(牛录)。

锡伯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清廷对八旗所规定的种种限制, 锡伯族不可能与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 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即清代满语满文所处的特殊地位, 使得锡伯族只注重满语满文的学习。锡伯营每个牛录都有私塾, 晚清还创办学校, 教习本营子弟学习满语满文。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将满文书籍传播到锡伯营。从四书五经到古典小说, 这些满文书籍在锡伯族民间广为流传, 成为广大锡伯族人民的精神食粮。这对新疆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起到了决定作用。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文字的发展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 由于政治, 经济, 社会, 地域, 文化等诸因素, 语言也会发生变化。满语满文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 也有内在和外部许多因素起了作用。除以上谈到的移驻新疆之前的语言状况, 清廷推行“国语骑射”文治与武卫国策所产生的巩固与促进作用, 以及锡伯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组织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外, 还有许多因素, 如锡伯族重视教育, 尊重知识, 崇尚学习; 锡伯族共同心理素质所折射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热爱自己的各种文化, 以及把语言文字视作一个民族的鲜明特点的意识等。这些因素也是锡伯族保存和发展满语, 满文的重要因素, 恕不在本文置叙。

《论锡伯族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8千字, 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修正稿 2006年11月

## ■ 内容提要 ■

满文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有近50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满语满文自咸丰朝以后逐渐衰微，满族逐渐改用汉语，汉文，到清末已基本放弃满语满文。而乾隆二十九年(1764)奉命西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其交际工具使用到解放前夕。1947年锡伯族学者将满文改革为锡伯文，锡伯文即满文的继续。本文对新疆锡伯族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

新疆锡伯族使用，继承满语满文，与锡伯族移驻新疆前语言现状密切相关。锡伯族是古代鲜卑后裔。明清以前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操用何种形式语言尚待进一步研究。锡伯族曾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归顺清朝，当时即能与满族互通语言，这充分说明他们操用的语言与满语极为相近。清政府入关后，将清军大批精兵强将派遣到全国各地，使盛京地区的防务相应削弱。至康熙年间兵力逐显薄弱，“由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等来充当八旗驻防兵。盛京兵丁已大多不讲满洲语，鉴于这种情况，清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驻防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地的74个牛录调入盛京地区。在强化盛京地区军事防务的同时，对于已不会讲满语的满族官兵，能够接触满语水平较高的锡伯族，对他们学习和巩固满语起到促进作用。真满语自康熙朝便逐渐衰微，至乾隆已很明显走下坡路，锡伯族西迁新疆之前的语言状况；其大环境是盛京地区满洲官会说满语者甚少，而锡伯族这个小群体均能说满语，这一语言基础，为迁居新疆的锡伯族日后继承发展满语满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清政府将“国语骑射”作为治国之本，将其视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基本国策来推行，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大清帝国的组成部分，必然也要推行这一政策。新疆地方行政机构与清中央政府的上呈下达的公文均使用满文，而且在民间，满文作为官方文字，比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等使用广泛。在清

廷推行“国语骑射”的治国政策感召下，少数民族积极学习满语，举办满文学堂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满文的地位。这种由社会各界营造的文化氛围，对于操用满语满文的西迁新疆的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疆锡伯族屯垦戍边所处的社会组织 and 地理环境，也为他们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在新疆推行的是军府制统治。兼有生产，行政和军事三种职能。锡伯族西迁新疆后被组建为伊犁锡伯营。锡伯营组织机构非常严密，八旗组织与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八旗组织范围内的所有活动，公务活动，民间各项活动都要受到八旗组织的监督，不准有任何超越该组织规定范围的行为，就人们的家庭活动，也要受其间接约束。锡伯营驻扎在新疆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河谷盆地。是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区。在这个地理环境下生活的锡伯族，又处在一个供给制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实体之下，锡伯族军民若要生存，必须紧紧依靠八旗组织，他们与八旗制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且锡伯营成员又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既锡伯族。这种社会组织，地理环境经济体系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文提供了重要保证。

锡伯族继承和发扬满语满文，除以上谈到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外，还有诸多因素，如锡伯族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崇尚学习；锡伯族共同心理素质所折射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热爱自己的各种文化，以及把语言文字视作一个民族的鲜明特点的意识等。这些因素也是锡伯族保存和发展满语，满文的重要因素，本文未叙及。

关键词：清代，锡伯族，满语满文

**논문 소개:** 만주문은 500년 가까운 역사를 갖고 있지만, 함풍제 이후로 점차 쇠미하였고, 만주족은 청말에는 기본적으로 만주어와 만주문을 방기하였다. 1724년 신강의 일리에 파견된 시버족은 중화인민공화국 수립 전야까지 줄곧 만주어와 만주문을 사용하였다. 1947년 시버족 학자는 만주문을 시버문으로 개혁하였다. 이 논문은 시버족이 만주어와 만주문을 사용하고 계승한 역사적 배경을 검토하였다.